

高句丽栅城遗址再考

朴真爽

1985年，笔者曾考证高句丽栅城遗址，并认为此遗址是由延吉市附近土城村土城（指河龙古城）和城子山山城联合在一起构成的。^①对此，有些学者持否定意见，主张高句丽栅城遗址应相当于琿春八连城附近的温特赫部城，这种观点使人颇受启发。然而，笔者现仍认为，自己原来的观点并没错，而且是正确的。下面，我将分两大部分，再次阐明笔者关于高句丽栅城遗址的观点，与关心此问题的广大读者讨论。

一、关于高句丽栅城遗址的 错误见解的批判

（一）驳温特赫部城说

主张温特赫部城是高句丽栅城遗址的学者主要是根据《新唐书·渤海传》、《三国史记》所引的《古今郡国志》、《辽史·地理志》等有关资料，认定高句丽栅城遗址只能求之于渤海龙原府管辖城之内。他们断定琿春八连城就是渤海龙原府所在地，而这里的出土遗物中没有一件是高句丽遗物，因此断定该城不是高句丽栅城遗址，于是主张高句丽栅城遗址必须求之于八连城附近的高句

^①《朝鲜问题研究丛书》，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1985年编，第37～49页。

丽城，而最符合这一条件的就是温特赫部城。这就是温特赫部城说的基本内容。这种见解乍看颇有道理，但只要深入考察，就可以发现温特赫部城说并不符合实际，不能自圆其说。以下笔者分三个方面指出温特赫部城说的讹误。

1. 他们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新唐书·渤海传》的有关记载，或者对此作片面的解释，把问题引入歧途。《新唐书·渤海传》有如下记载：

“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涉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柵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领活、睛、椒三州。”^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中“涉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柵城府”的记载。有些学者先介绍这一段记载，接着分析道“由此可知龙原府与柵城府是同一地区并且位于涉貊故地”强调高句丽“柵城必须求之于‘涉貊故地’位于上京东南的东京龙原府，即今日琿春一带……求之于东京龙原府一带”。^③

笔者认为这一分析有明显错误。首先是误解了涉貊故地与渤海东京龙原府以及高句丽柵城的关系。所谓涉貊，指建立古朝鲜、扶余、高句丽等国的种族，或者称涉或者称涉貊或者称貊。他们的分布范围比渤海东京龙原府的管辖范围大得多，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以朝鲜半岛江原道为中心的地区有一种族，叫作涉或称涉貊，有的古书称之为“涉貊

《延边大学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延边大学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1989年编，第253~260页 方学凤《渤海遗迹及其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1~102页。

《新唐书》卷219，列传第144，北狄，渤海传。

③ 方学凤：《渤海遗迹及其研究》，第92页。

国”。然而实际上，在江原道一带的所谓 涉貊之地与渤海东京龙原府之间，夹着一个渤海南京南海府，因此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这就证明《新唐书·渤海传》的“涉貊故地为东京”的记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于是金毓黻先生认为《新唐书·渤海传》中“涉貊故地为东京”，“沃沮故地为南京”，这两条记载把“涉貊故地”与“沃沮故地”对换了，这是撰史者的笔误。^①金毓黻的这一见解也许还有一些问题，这主要是江原道一带的 涉貊 或称东 涉 族与设在咸镜南道一带的渤海南京南海府之间，究竟有多少关系，这还是一个疑点。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我们下这样的结论：《新唐书·渤海传》的上述记载有误。如果这一判断无误，那么上述“涉貊故地为东京”，应更正为“沃沮故地为东京”，这才符合历史事实。在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应全面地分析和理解“沃沮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柵城府”一句。首先通过“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柵城府”这一后半部分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东京龙原府也称柵城府。从一些古籍来看，渤海龙原府（柵城府）与高句丽柵城有某种关联，也许渤海因袭了高句丽城名。因此最好是根据有关资料的或多或少的记载，先确定渤海龙原府（柵城府）的位置，然后在此基础上考证高句丽柵城的位置。但是这还不够，必须在这一前提之下认真分析上述记载前半部的“沃沮故地为东京”一语。通过这一记载可知，渤海东京龙原府（柵城府）就设在沃沮故地。这证明高句丽柵城遗址不仅与渤海东京龙原府（柵城府）有关，而且证明与沃沮故地也相关。因此，高句丽柵城遗址不仅应求之于渤海龙原府（柵城府 辖域 而且也应求之于包括渤海龙原府（柵城府）与沃沮故地在内的地域。

沃沮又分为北沃沮与东沃沮（亦称南沃沮）因为东沃沮 南沃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第 281 页。

沮)之地,与渤海南京南海府相关,在此从略,只就北沃沮之地试作考察。学界普遍认为北沃沮的领域包括琿春、延吉在内的延边一带,黑龙江省的东宁县、朝鲜咸镜北道、俄国远东的一部分地区。^① 这证明考证高句丽栅城遗址时,不能仅仅求之于琿春一带,而应求之于上述各个地域(即包括琿春、延吉在内的延边一带,黑龙江省的东宁县 朝鲜的咸镜北道等地)笔者确信 只有这样做,才算全面、正确地理解上述《新唐书·渤海传》的内容。

可是一些学者却未能全面地分析这一问题。他们实际上只分析上述《新唐书·渤海传》引文中的后半部分“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对于前半部分“沃沮故地为东京”一句却不加分析,原封不动地依从其字面上的含义。

还有一些学者首先介绍上述《新唐书·渤海传》以及《三国史记》所引《古今郡国志》的有关记载“渤海国南海、鸭绿、扶余、栅城四府,并是高句丽旧址也),指出:“由此可见,渤海东京龙原府也叫作渤海栅城府,这意味着渤海龙原府与高句丽栅城之间有某种关系。”^② 他们从这种观点出发,认定琿春八连城附近的温特赫部城就是高句丽栅城遗址,而延吉附近的“城子山山城一带属于渤海中京显德府辖域,并不属于东京龙原府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将此地考证为高句丽栅城遗址似乎是欠妥的。

他们的上述见解只强调上引《新唐书·渤海传》记载的后半部分(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对于其前半部分(沃沮故地为东京)则置诸不顾,于是导致了片面的完全错误的结论。

2. 《辽史·地理志》也同上述《新唐书·渤海传》一样成了一

林云:《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一期,《朝鲜全史》5,平壤,科学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延边大学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58页。

些学者主张高句丽栅城遗址必须求之于渤海龙原府辖域之内的文献依据。这一见解可以说没有科学根据，因为《辽史·地理志》的记载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辽史·地理志》有如下记载：

“开州，镇国军，节度。本涉貊地，高丽为庆州，渤海为东京龙原府。有宫殿。都督庆、盐、穆、贺四州事。故县六：曰龙原、永安、乌山、壁谷、熊山、白杨、皆废。叠石为城，周围二十里。唐薛仁贵征高丽，与其大将温沙门战于熊山，擒善射者于石城，即此。”

“开远县。本栅城地，高丽为龙原县，渤海因之，辽初废。”^①

引人注目的是这段记载中说高句丽（引文中“高丽”指高句丽）有关州和龙原县，还说庆州与渤海东京龙原府是一个地方，龙原县也是东京龙原府属县。这给后人考证高句丽栅城遗址，探讨高句丽和渤海史的一些问题造成了不少混乱。笔者以为上引《辽史·地理志》的记载有很多矛盾，不符合实际，不足信，理由如下：

其一，辽统治者灭渤海之后，把东京龙原府渤海遗民强迁至新设的开州（现辽宁省凤城县）在这种情况下，《辽史·地理志》的编者在记述设开州的过程之前，写上了他们的原地东京龙原府的沿革。问题就在于把这一沿革的上限追溯到高句丽，于是造成了各种混乱。再则，将新设的开州与东京龙原府混为一谈，没有分清二者的所属关系及其界线，给后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例如“叠石为城，周围二十里”，有的人认为这是指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一些人主张这是指新设的开州城。除此而外，《辽史·地

^①《辽史》卷 38，地理志 2，东京道，开州，镇国军条。

理志》还把涉貊之地与渤海东京龙原府当作一地，这也与事实不符。这是因为渤海东京龙原府不是设在涉貊之地，而是设在沃沮故地。再说，高句丽有庆州或者龙原县的记载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由此可见，上引《辽史·地理志》的记载讹误甚多。今天学术界普遍认为《辽史》所记述的开国前和濒临灭亡时期的历史，是错误百出的，这一评价绝不是无中生有。

其次，《辽史·地理志》说高句丽有庆州和龙原县，还说这些地方与渤海东京龙原府同是一个地方，这一记载不符合《三国史记》的有关记载。以下先介绍《三国史记》中有关的记载。

(1) 东明王“二年(公元前36年一笔者)……松壤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郡，封松壤为主。

(2) “六年(公元前32年)……伐太白山东南苻人国，取其地为城邑”。

(3) “十年(公元前28年)……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

(4) 琉璃王“十一年(公元前9年)……鲜卑首尾受敌，计穷力屈，降为属国”。

(5) 大武神王九年(公元26年)……王亲征盖马国……以其地为郡县。”

(6) 太祖王“四年(公元56年)……伐东沃沮，取其地为城邑。”

(7) 宝藏王“四年(公元645年)……李世……攻盖牟城拔之……以其地为盖州……攻辽东城……以其地为辽州……以白岩

《简明中国古籍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87页；《东北通史》上编，第299~336页。

城为岩州。^①

(8) 新罗文武王“六年(公元 666年)……高句丽贵臣渊净士以城十二,户七百六十三,口三千五百四十三来投。”

(9) 文武王“八年(公元 668年)……六月……二十二日,府城刘仁愿遣贵干未盼,告高句丽大谷 汉城等二郡十二城归服,王遣一吉飧,真功称贺。”^②

(10) 高句丽宝藏王“二十七年(公元 668年)……分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③

(11)“总章二年(公元 669年),英国公李勣奉敕,以高句丽诸城,置都督府及州县。”

《三国史记·地理志》高句丽条末尾还详细记下了高句丽州、郡、县的名称,写道“右高句丽州、郡、县,共一百六十四”。^④

以上列举了《三国史记》关于高句丽地方统治机构的几乎全部记录。由此可以大致了解如下情况。

其一,通过上引资料 2)、(3)、(4)、(6)、(8)~(11)等,高句丽前期和后期的地方统治机构,主要是五部制度和城邑制度。因史无记载,中期的情况不详。但是根据前期和后期的情况推测,想必中期也是以五部与城邑为主的。不过前期除了邑制度之外,并存着独立性较大的侯国(或者属国),但到了后期,逐渐统一为城邑制度的,当然这是加强王权的过程中出现的必然趋势。

《三国史记》卷 13《高句丽本纪》1 卷 15,《高句丽本纪》3 卷 21《高句丽本纪》9。

《三国史记》卷 6,《新罗本纪》6,文武王 6 年、8 年条。

③ 《三国史记》卷 22,《高句丽本纪》10,宝藏王 27 年条;《旧唐书》卷 39,志 19,地理 2;《新唐书》卷 39,地理 3;卷 43,地理 7 下。

《三国史记》卷 37,杂志第 6,地理 4,高句丽条。

上引资料(8)、(10)表明,唐于公元668年灭高句丽后,改编了原有的地方统治机构,此时高句丽有5部、176城、69万多户。两年以前,即于公元666年,渊净土率12城、763户、3543人归顺新罗。值得注意的是上引两个资料中,全然不见州、郡、县的名称。由此可以推知,高句丽后期似乎形成了以部、城、户、口为主的地方统治体系。

《旧唐书》说“高句丽,旧分为五部,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这一记载是以证明上述推测是正确的。

其二,通过上引资料(1)、(5),可以看出高句丽在建国初期也存在以“郡”、“县”为地方统治机构的情况。但是记载过于简略,无法了解当时设郡县的具体情况。

看来,直至高句丽末期也有州、郡,据上引资料(7)记载,公元645年唐军在所占地暂时废城设州。又据上引资料(9),公元668年6月,高句丽灭亡前夕,唐将刘仁愿派人去新罗通报情况,其中有(高句丽)“二郡十二城归服”的记载。把这一资料与上述(1)、(5)等资料联系起来,就可以推知高句丽在存续期间自始至终都有郡县制度(虽居次要地位),但其具体内容究竟如何,这已无从考察。

公元668年至669年,高句丽为罗唐联军所灭,而后在全国范围内以郡县制度代替了城邑制度,上引资料(10)、(11)足以证明这一点。

看来,高句丽存续期间,其地方统治机构是以五部制与城邑制为主,以郡县制为辅的。可是郡县制的具体内容以及郡县与城邑的关系等都不详。

其三 由上引第 11 条资料可知,《三国史记 地理志》高句丽条列举高句丽州、郡、县的名称 164 个,而后写道“右高句丽州郡县,共一百六十四”。但因只有其名而无其他说明,对于它的存续年代无法了解具体情况。但从所引资料的语气看来,这绝不是介绍某一局部地方的州、郡、县的分布情况,而无疑是记述全国的情况。但在这 164 个州、郡、县的名称 其中还包含着“别称”)之中,却不见庆州和龙原县之名。高句丽亡后,它的部分领土归新罗占有。据《三国史记·地理志》记载,在新罗领土的这一疆域,新罗共设 154 个州、郡、县 并且一一介绍了高句丽时期的郡、县名称,可是其中也没有庆州和龙原县之名。

上述情况证明,高句丽的州、郡、县中,没有以庆州、龙原命名的州、县。

《三国史记》是朝鲜现存的最早的史籍,专门记述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朝鲜古代国家的历史。该书有关部分中不见庆州和龙原县之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此外,高句丽灭亡以后,大同江以北的部分领土归属于唐,大部分国土为渤海所占据。鉴于这种情况,笔者也查看了《旧唐书·渤海传》、《新唐书·渤海传》等中国古籍,其中也没有关于高句丽庆州和龙原县的记载。金毓黻先生则说“辽之开州,本为渤海庆州所徙置。志云高丽为庆州,殊误”^② 这一见解尤其引人注目。他的见解符合《三国史记》的有关史料 也符合《新唐书·渤海传》以庆州为渤海东京龙原府属下首州,以龙原县为该州属下首县的记载,是颇有见地的,笔者还以为《辽史·地理志》中辽的开原县也是由渤海龙原府辖下龙原县徙置的。因此,《辽史·地理志》说辽

② 《三国史记》卷 35,杂志第 4,地理 2。

③ 《东北通史》上编,第 324 页。

的开原县“高丽为龙原县，渤海因之”的记载也是错误的。

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辽史·地理志》的“开州……高丽为庆州，渤海为东京龙原府”，“开远县，本栅城地，高丽为龙原县，渤海因之”的记载，令人难以相信，很可能是误传。如若这一判断无误，那么一些学者根据上述《辽史·地理志》的记载主张高句丽栅城遗址必须求之于渤海东京龙原府辖域，这是根本错误的。

3. 温特赫部城位于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琿春八连城附近，这里出土的高句丽遗物和渤海遗物都比较多，这就是一些学者把温特赫部城推断为高句丽栅城遗址的重要的考古学依据。这种见解还有许多疑点，缺乏科学根据。

把琿春八连城推定为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这是有道理的。笔者已在《高句丽栅城遗址考》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①而且至今仍未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可是看来这种见解还有一些弱点。这与东京龙原府位于“日本道”一事相关。渤海在其存续的 229 年里，一共向日本遣使 34 次，其中从东京龙原府出发的多达 33 次，而且 13 次是从 11 月至 1 月的冬季派出的。如果东京龙原府所在地就是琿春八连城，那么由此派出的遣日使节先由陆路抵达位于波谢特湾的毛口崴，由此改乘海船驶往日本。这是因为毛口崴离八连城最近，而且符合“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的《新唐书·渤海传》的记载。可是最近一些学者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指出朝鲜“咸镜北道先锋郡及其以北沿海，因冬季结冰，不能行船，那些船只只有在在不结冰的罗津港及其以南沿海，冬季能启航。”^②翻开地图，就会发现波谢特湾位于咸镜北道罗津港以北，这意味着

^① 《朝鲜问题研究丛书》第 38~39 页。

朝鲜《历史科学》，1990 年，第 3 期，第 50 页。

位于波谢特湾的毛口崴港因冬季结冰，不能行船。如果一千多年前的气候条件与现在一样，那么，冬季驶往日本的渤海遣日使节的启航地点不应是毛口崴，而应是咸镜北道东海岸罗津以南的某一港口。然而这一地点不在珲春八连城的东南，而在西南。这与《新唐书·渤海传》中“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的记载相矛盾。

上述情况对于把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推断为珲春八连城的见解来说，的确是一种挑战。但这一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课题，只好就此从略，留待今后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即使在珲春八连城，也不必非在八连城附近寻找高句丽栅城遗址不可。这是因为高句丽栅城址未必非求之于东京龙原府辖域之内，甚至求之于龙原府所在地附近。笔者以为高句丽栅城址应求之于包括渤海东京龙原府以及沃沮故地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地或（珲春、延吉等延边一带，黑龙江省东宁县，朝鲜咸镜北道一带等）。只有如此，才与《新唐书·渤海传》的“沃沮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这一记载相符。一些学者把高句丽栅城遗址的位置局限于渤海东京龙原府辖域之内，甚至求之于东京龙原府所在地八连城附近，这与上述《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没有任何共同性，所以说，温特赫部城与八连城距离相近，这一点并不能成为把温特赫部城推定为栅城址的唯一科学根据。

有的学者把温特赫部城内出土了较多高句丽遗物和渤海遗物这一事实与《辽史·地理志》的“开远县，本栅城地，高丽为龙原县，渤海因之”的记载联系起来，主张温特赫部城就是高句丽时的龙原县，渤海因袭其名，断定这里就是高句丽栅城遗址。他们说“总而言之……从文献记载、出土遗物以及地理条件等看来，只

有温特赫部城才具备为栅城址（指高句丽栅城遗址—笔者）的条件。^①这种见解缺乏科学根据。

看来，他们提出的温特赫部城说的根据之一是这里出土的高句丽、渤海遗物十分丰富，这一点符合事实。但这不过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再说同时发掘出高句丽、渤海遗物的古城址绝不止这一处，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温特赫部城就是高句丽栅城址。

温特赫部城说的另一个根据是《辽史·地理志》的“开远县本栅城地，高丽为龙原县渤海因之”的记载。这一记载本身有误，不足信。前文已经详细分析了这一问题，在此恕不赘述。

不管怎么说，高句丽根本就不存在“龙原县”，一些人把这并不存在的“龙原县”与渤海龙原县当作一地，认为其地就是温特赫部城并且把它推定为高句丽栅城遗址。笔者以为这一推论的前提就是错误的。

再说温特赫部城与八连城一样，位于广阔的琿春平原，附近没有什么山。这与《三国史记》“王东巡栅城……遂纪功于岩”的记载也不相符。该城与八连城一样都是平地城，附近也没有山城。这与在同一地区同时建造平地城与山城的高句丽人的筑城特点也不相符。

上述种种情况证明，温特赫部城说缺乏科学根据，也不符合实际。

《渤海遗迹及其研究》，第 95~96 页。

（二）琿春境内其他城址与高句丽栅城遗址的关系

有些学者主张高句丽栅城遗址必须求之于渤海东京龙原府辖城之内，其中大部分人都想在琿春境内寻求高句丽栅城址。这里的有关城址除了温特赫部城外，还有八连城、萨其城、城墙砬子城等。下面就这些城与高句丽栅城址的关系略陈己见。

其一，八连城与高句丽栅城的关系

过去，大部分学者认为琿春八连城就是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同时也是高句丽栅城遗址。如今不少学者仍然认为八连城是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可是这里的出土品中没有高句丽物，认为它不可能是高句丽栅城遗址。八连城不能成为高句丽栅城址，这一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对此笔者已在《高句丽栅城遗址考》中予以论及，并且主张高句丽栅城址是由延吉市附近的土城村土城（指河龙古城）与城子山山城合成的。八连城虽是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但绝不是高句丽栅城遗址。笔者的这一基本观点至今仍未改变。

其二，萨其城与高句丽栅城的关系

萨其城位于琿春市杨泡乡杨木林子村附近（琿春市东北约 13 公里处）这是石筑山城 周长 7 公里 有人说是 5 公里）城内发现绳纹、方格纹等红褐色高句丽瓦。萨其城与八连城距离相近，规模较大，且有高句丽瓦等遗物，有些人便以此为理由推定该城与距此相距 3~4 华里处的东岗子遗址（杨木林子遗址）合成高句丽栅城遗址^①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

高句丽栅城遗址，没有必要非在琿春八连城附近寻求不可。笔者以为应求之于包括延边（延吉、琿春等地）黑龙江省东宁县、朝

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第 73~74 页。

鲜咸镜北道等地区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疆域，这才符合《新唐书·渤海传》中“沃沮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柵城府”的记载。有些人把高句丽柵城遗址的范围局限于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的琿春八连城附近，他们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因为只片面地强调《新唐书·渤海传》中上述引文记载中的后半部分“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柵城府”。

萨其城虽然规模较大，且有高句丽瓦出土，但附近没有颇具规模的平地城，而东岗子遗址（杨木林子遗址）并不是平地城。这是萨其城说的一大弱点，它不符合高句丽城的特点：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同时筑造平地城与山城。尤其重要的是柵城位于北沃沮故地，是那里的高句丽大城，柵城之名不仅传为中国所知，而高句丽王曾经亲自巡幸此地，而且将归附的汉人百姓一千余户安置于此，可见该城是高句丽东北边锤重镇，是其政治、军事的中心，怎能没有平地城只以山城构成呢？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

其三，城墙砬子山城与高句丽柵城的关系

城墙砬子山城就在琿春市春化乡草坪村以东 1.5 公里处的城墙砬子山伐上，该山城位于琿春市东北约 100 公里处，城墙周长达 10 公里，是这一带的第一大山城，以前曾在城内出土刻有“大同”年号的铜印，但如今已难以寻觅遗迹、遗物。有的学者主张该城是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同时也是高句丽柵城址，笔者不同意这种见解，理由如下：

首先，该城规模虽大，但就其构造而言，只有山城，附近没有平地城。这不符合高句丽人在同一地方既筑山城，又造平地城的筑城特点。

城内没有发现什么遗物，因此对于该城筑造的年代也没有统一的见解，有的人以为是高句丽人筑造，渤海人沿袭使用的。还有些人根据以往曾经在此发现刻有“大同”年号的铜印的事实，相

信这是辽金时代的古城。有的人说城墙砬子山顶根本没有城址，连“城墙砬子山城”这一名城也予以否定。

其次，该山城位于珲春市东北 100 多公里 有些人说是 110 公里处。《三国史记》所引《古今郡国志》说 从新罗井泉郡到渤海栅城府（即龙原府）之间 共有 39 驿，相距 1170 里。而该山城的位置也就不在这 39 驿、1170 里之内，也可能与此相距甚远。这就足以证明把城墙砬子山城当作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同时又把它看作高句丽栅城遗址的见解，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根据上述理由，笔者以为城墙砬子城也不是高句丽栅城遗址。

二、高句丽栅城遗址再考

如上所述，笔者曾经指出延吉附近的土城村土城与城子山山城合起来构成高句丽栅城遗址，而且至今未改变当时的基本观点。因此，本文拟在前文考证的基础上补充一些新的资料，或者对部分内容作些修改，以充实前文提出的根据。笔者的结论是：延吉市兴安古城与城子山山城以及土城村土城（指河龙古城）共同构成高句丽栅城遗址。理由如下：

（一）高句丽栅城遗址不仅应求之于渤海东京龙原府所在地珲春八连城附近，而且应求之于包括沃沮故地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地域。其中包括延边一带的珲春、延吉，黑龙江省的东宁县，朝鲜的咸镜北道等地。因此，在延吉市附近寻求栅城遗址是有道理的。笔者以为这一见解正确地反映了《新唐书·渤海传》中“沃沮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的记载。一些学者指出延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珲春县文物志》，1984年编，第49~50页；
《东北史地考略》第67~71页。

吉市附近不属于渤海东京龙原府辖域，而属中京显德府管下，因此，不能在这一带寻求高句丽栅城遗址，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

（二）延吉一带属于北沃沮辖域。《三国志·北沃沮传》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的记载，同书《高句丽传》又说“沟娄者，句丽名城也”^①，由此可知北沃沮也叫做“置构娄”这与在此设有高句丽大城一事有关。有些学者认为“置构娄”即“置城”之意，而“置城”则是“栅城”的音变，他们又认为北沃沮确实有过“栅城”^②。笔者认为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理由如下：

第一 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东明王“七年……王命扶尉 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东明王 10 年相当于公元前 28 年，而栅城之名始见于史籍，则是公元 98 年。由此可知，高句丽将北沃沮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是高句丽设栅城以前一百来年的事。这证明，在北沃沮设有高句丽栅城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有如下记载：

太祖王“四十六年（公元 98 年—笔者）春三月，王东巡栅城……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遂纪功于岩，冬十月 王至自栅城。”

“五十年（公元 102 年）……遣使安抚栅城。”^④

在此有必要先说明一下“王东巡栅城”一句。严格地说，北沃沮位于当时高句丽首都（现集安市）之东北，这意味着栅城在高

《三国志》卷 30，《魏志》卷 30，东夷，北沃沮传、高句丽传。

《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第 414 页。

《三国史记》卷 13《高句丽本纪》1 东明王 10 年条；《三国史记》卷 15《高句丽本纪》3，太祖王 46 年，50 年条。

《三国史记》卷 13《高句丽本纪》1 东明王 10 年条；《三国史记》卷 15《高句丽本纪》3，太祖王 46 年，50 年条。

句丽首都的东北方向。可是《三国史记》并没说“王东北巡栅城”而是“王东巡栅城”，所记其方位是否有矛盾呢？不然。这是古籍记录方位时常有的事，不能把它当成很大的问题。例如夫馀确实位于万里长城的东北方向，可是《三国志·夫馀传》却说“夫馀，在长城之北”，并没说“夫馀，在长城之东北”^①。看来，《三国史记》中“王东巡栅城”的记载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北沃沮有栅城一事。

《三国史记》的上述记载表明高句丽国王曾亲自巡幸栅城。公元 98 年高句丽太祖王巡幸栅城，按官吏等级，分别赏赐物品，并把他们的功劳铭记于岩石之上。4 年以后，太祖王再次派遣使臣愿劳栅城官民。这足以证明栅城是名副其实的高句丽东（北）部边阿重镇，是高句丽设在北沃沮故地的“大城”。

上述事实证明，在北沃沮故地寻求高句丽栅城遗址的作法是正确的。那么高句丽栅城遗址究竟是哪一個城呢？笔者拟在下文另述：

（三）北沃沮领域包括延边一带（珲春、延吉等）黑龙江省的东宁县，朝鲜咸镜北道等地方。在这一地域的古城址中无愧于“高句丽大城”的称誉，并且与各自相关的古籍记载相符的古城遗址只有延吉市郊的兴安古城、城子山山城以及河龙古城（土城村土城），笔者以为栅城是这三座古城合起来构成的。理由如下：

第一，若把上述三城合起来，其规模就非常大。

兴安古城位于延吉市北端现兴安乡政府附近，城墙大都坍塌毁坏，城址并不明显，东墙与北墙址比周围地面略高，所以还能看出这里曾经有过城墙，而且可以看出城墙底部是石筑的，由此可以推定该城是土石混筑城。该城西墙，受烟集江冲刷，未留下什么痕迹，南墙早被夷平，该城周长大致推定为 1800 米。该城东

^①《三国志》卷 30《魏志》卷 30，东夷，夫馀传。